

□师文静

近日,借由西方万圣节,上海的年轻人打造了一场像“百变大咖秀”一般的cosplay海洋,让这个西洋节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本土化。从上海万圣节狂欢的大众反应来看,不少观点支持西方洋节的本土化改造,也认为“只要不影响公序良俗,年轻人释放一下自我也挺好”。更有评论认为,大家对过洋节不必过于敏感,对年轻人宣泄生活压力的狂欢方式,多点包容,少点指责和说教。而这其中,最有趣也最令人想探讨的,是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流行文化,借由这些流行文化索取或宣泄怎样的情绪,表达怎样的价值观?

西方万圣节本来的习俗是大家穿女巫、吸血鬼和骷髅等鬼怪的衣服,以恐怖的样子吓走鬼魂,保佑平安健康,小孩们则可以提着自制的南瓜灯入户索要糖果,嘴里还会喊着“不给糖,就捣蛋”。现在的万圣节文化“入侵”各个国家,在每个国家都会与当地文化兼容并蓄存在,早已失去恐怖色彩,而成为了狂欢式、戏谑式娱乐节日。

刚过去的上海万圣节cosplay狂欢中,大家看到了年轻人灵动、鲜活的多元化表达,他们凭借着对本土流行文化的巧妙运用和发挥,完成了对万圣节这个洋节的本土化改造,赢得了不少关注乃至叫好声。

这场大型cosplay狂欢中,有太多的本土流行文化元素被大家关注,比如,乘船出游的安陵容、跳惊鸿舞的甄嬛、全套装备的哪吒、跳热舞的蔡依林、酷拽的宋焰、《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和神仙妖魔鬼怪、《武林外传》中的燕小六、《情深深雨蒙蒙》中的如萍和杜飞、《百变大咖秀》中明星模仿秀的集体cosplay、各个仿版周杰伦、模仿那英的“这英”以及直播中的向太、黑牙的丁真、“哪里贵了”的李佳琦等。这其中,《甄嬛传》中的名角色、模仿那英的“这英”等出镜率非常高。年轻人偏爱这些人物、角色,这些流行文化元素能成为娱乐性很高的“玩梗”对象,其实也蕴含着年轻人的态度和社会情绪表达。在这场狂欢中,年轻人借由流行文化展开的自我态度表达,是对西方文化的消解,同时也是年轻人自我内在意识、自我诉求的一种外化和宣泄。

以人人热爱的《甄嬛传》为例,这部剧播出十多年,依旧是流行文化“玩梗热”的首选,说明这个作品奇迹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部快销性质的宫斗剧怎么就被年

轻观众放不下?“甄学家”到底在《甄嬛传》里看什么?当代年轻人看的其实是《甄嬛传》中每个角色在“吃人不眨眼”的宫廷生活中闪转腾挪的生存逻辑。剧中女主角甄嬛从一个少女成长逆袭为大女主之路,让这个角色很具有现代性。但其成长过程、爱情历程崎岖复杂,有对权力者的真心付出,有对复杂盟友关系的成熟应对,有对敌上位的心机计谋,有“终究是错付了”的替身侮辱,以及狠辣的反叛式复仇等,人物身上有“爽点”,也有“虐点”,更多的是观众感兴趣的“活下去,站起来”的生存法则。

甄嬛能不断地被解读、被热爱,这固然说得通,可为何大家更喜欢安陵容?甄嬛是“大女主”,而安陵容则可能折射着普通的你我他。安陵容是后宫里嫔妃之中出身最“低贱”的人,她内心在心理中有太多东亚家庭教育下的女孩与生俱来的枷锁和负担。比如,她费尽心思入宫,必须努力活成自身家庭的顶梁柱,进入社会生活后却发现不过是最底层“拿抹布”的人,人人皆可践踏,却只能默默吞下所有委屈和寂寞。安陵容在后宫生活中多次救自己的父亲,成为被敲骨吸髓的女儿。此外,安陵容那扭曲、痛苦的心态,也映射着底层普通女孩的心理,她对自我的否定、她的“不配得感”、无法接纳自己的苦痛等,让观众品出了太多自己的人生。

魔童哪吒、《情深深雨蒙蒙》中的如萍和杜飞、模仿那英的“这英”、“哪里贵了”的李佳琦……年轻人模仿的是流行文化元素,但表达的是多元丰富的观点,是对时代与社会的看法,这里面有年轻人反传统的叛逆、婚恋观、对真性情的追捧,对傲慢的批评等。用网友的话说,“看似一个个披上了伪装,实际是真正做了一回自己”,通过看似疯狂、戏谑的方式,说出了真正想说的话。放出身体里压抑的安陵容,模仿一下会惹人的那英,调侃一下看不惯的名人,年轻人需要的就是一个单纯能狂欢起来、放飞的氛围。

把戏曲和说唱RAP融合在一起的是年轻人,把越剧玩出“嗑CP”大餐的是年轻人,玩活了一批又一批网络流行语的也是年轻人,把古筝在国外街头弹火的也是年轻人……年轻人在网络上掀起一波波“佛系生活”、锦鲤热、鬼畜文化、土味文化以及国风文化等多元亚文化流行热潮,也正是有了这些多元表达,枯燥的生活变得更有趣味。

□张迪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如期而至。其实历朝历代也有类似“双十一”的购物节。一般认为,最早的购物场所“集市”起源于商周时期。《易经·系辞》里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中午开市,有买有卖,各取所需,这应是古代购物节的最早雏形。

查阅现存史料可知,集市一般设在人口密集处,每周开市一次,方便居民购物。消费者也会提前将所购之物列出清单,放在荷包里随身携带。唐代以后,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市民购物需求不断增长,集市规模进一步扩张,政府为此设置“市令官”专职管理市场交易,形如今天的淘宝客服,维持市场秩序,调节买卖纠纷。

那么古人购物如何付款?和现在相比,古代的货币形式混杂,支付方式可要麻烦多了。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交易需求比较有限,因而多是“以物易物”为主。直到后来,才产生了交换的中介物——货币。据考古学家发现,很多国家多采用海贝作为原始货币,中国古代也是如此。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由此产生了人工铸币。

或许是冶炼技术要求不高的缘故,多数国家不约而同采用了铜作为货币的主要原料。譬如中国的商朝就是用铜仿制海贝,而铜币随后历经各朝各代,使用了三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国内的铜币铸造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当时,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铸有铜币,其中又以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楚国的蚁鼻钱比较出名。这些铜币,至今时有发现。

秦始皇灭亡六国后推行统一政策,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货币也是一样,“以秦币同天下之币”。之后,原通行于秦国的圆形方孔钱被推广到全国,这就是所谓的“半两钱”。值得一提的是,由秦朝“半两钱”确定的“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制,一直延续到清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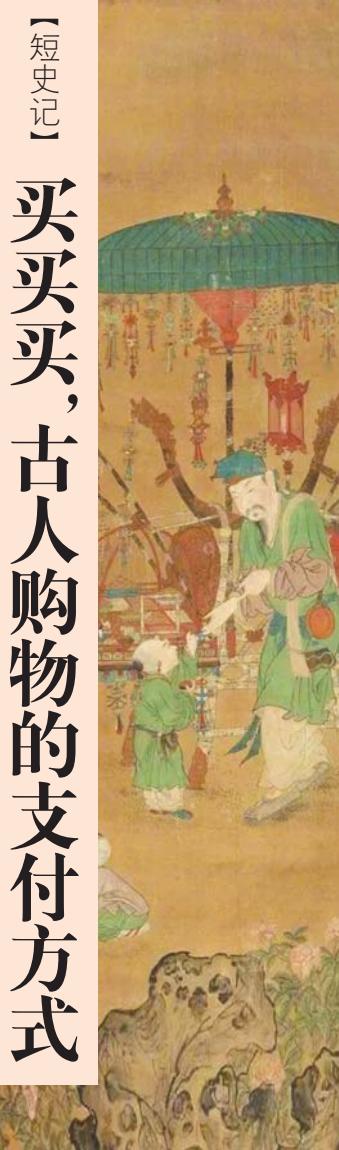
汉朝以后,从汉武帝开始铸币权收归中央,民间铸币被视为非法,当时的“五铢钱”是汉朝唯一的合法货币。秦汉时期的铜币,“半两”或“五铢”都是钱的重量(二十四铢为一两),这一做法在唐朝后有所改变。

据《旧唐书·食货志》中的记载:“(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这就是说,唐高祖李渊改革币制,钱文不再强调重量而改用“通宝”,这种做法也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宋朝以后,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铜币铸造进入高峰期。据统计,北宋时期大约铸造了2.5亿贯铜钱(每贯一千文),远远超过其他朝代,大概也只有清朝才能与之媲美。

铜币以外,中国古代也曾铸造过铁钱,不过应用面远不如铜币。此外,在明朝尤其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银两开始成为与铜币并列的主流法定货币。之所以采取银两作为主流货币,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铜币价值低,不利于商品交换,尤其是长途贸易,而金币的价值又太高,同样不适合交易。

明清时期,货币流通模式大体以银为主、以钱为辅,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银钱混合制”。在实际生活中,这一模式往往体现为“大处用



【短史记】买买买,古人购物的支付方式

银、小处用钱”。也就是说,在大宗贸易或者购买贵重物品时通常使用银两结算,而一般日常生活比如买买菜、喝喝茶,一般就用铜钱。否则的话,携带一个大元宝去吃饭,不说裤兜吃不住这小四斤的重量,就是去了饭店,那主人也没法找零,因为一锭大元宝几乎能把店里所有东西都买下了。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使用银两也很不方便,因为银两有银饼、银铤、银元宝、零碎银子等各种形制,使用时既要称重量,又要看成色,非常麻烦。而且,由于是银、钱双轨,其中的换算就很重要了。明朝诗人何景明在《岁晏行》中说,“白金纵有非地产,一两已值千铜钱。”这说的是白银一两可兑换成一千文铜钱。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这个兑换率有所不同,有时波动甚至达到一两倍。

清朝的铜钱又叫“制钱”,一枚制钱是1文钱,1000文又称“吊”或“贯”。按官方规定,1两银子应兑换1000文。但在民间,银价和钱价一直在变动,如清初制钱投放不足,1两银子只能兑换800制钱;乾隆朝后,银价上涨、铜价下跌,1两银子就不止兑换1000文了;道光朝时期,由于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1两银子甚至可兑换2000文以上;而晚清时期,1两银子兑换的制钱数一般在1100文至1800文之间徘徊。

值得一提的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元等开始流入我国。由于外国银元形制规范、价值稳定,因而在沿海一带很受欢迎。受此启发,清末时期清廷户部和各省也纷纷铸造银元、铜元,而由此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对各省新政如练新军、办教育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论,但过多的铸造铜元同样会带来通货膨胀。据统计,1905年时全国已有17省开铸铜元;至1907年时,各省铸造铜元多达124亿枚;1910年时,流通市面的铜元价值已达1亿两,这还没算上国内外私铸的铜元。相对应,清末十年的物价较以往也有明显上涨。

作为金属货币,铜元带来的通胀和纸币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一般认为,北宋时期的“交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最早出现在四川,由成都十多家富商联合发行,它既可以在市场上使用,也可以到“交子铺”兑换现钱。宋仁宗天圣元年,交子改由政府统一发行。南宋时,交子改称“关子”“会子”,但由于发行量过大而导致持续贬值。

元朝时期,虽然也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当时主要以宝钞为流通货币。这种以纸币为主的朝代,在中国古代是十分罕见的。最开始时,宝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元朝统治者即滥发纸币来弥补开支,最终物价飞涨,重蹈覆辙。明朝初年,朱元璋也曾推行“大明宝钞”,但抑制不住的发行量和遏制不了的通胀贬值,最终让大明宝钞不了了之。

清朝时期也发行过纸币,最开始是顺治八年(1651年)发行“钞贯”,10年后废止;后来在咸丰三年(1853年)时,因为太平军起义,清廷银钱两断、风雨飘摇,不得已而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然而,在完全没有后备金的情况下,所谓“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几乎没有信用可言,推行不到两三年后即沦为废纸,之后即被清理,不再使用。直到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强力推行法币,实行了三千多年的金属货币才陆续退出流通市场。之后,中国也真正进入了纯粹的纸币年代。